

面向公众修辞的未来博物馆

The Museum of the Future Adresses

M·伊丽莎白·韦瑟

M. Elizabeth Weiser

(俄亥俄州立大学, 哥伦布, 43055)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43055)

内容提要: 为了融入我们的世界, 现代博物馆已经成为个人与博物馆之间的“多元文化谈判平台”^[1]。因此, 现代的博物馆的使命并不是传播知识, 而是在与其意见相左的社区中产生影响, 新博物馆学就要研究这些影响。以参观者反应为中心是向参观者意识的靠拢, 从而导致博物馆研究更接近修辞学。按照古典修辞学的观点, 一旦现在的参观者成为关注的焦点, 博物馆就会从主要关注历史正确性与否的机构, 转变为主要关注现世修辞性的机构。作为一个知识机构, 修辞学的视角可以给博物馆学带来新的动态和见解, 因为修辞学的关注点在公众及其在公共领域中集体行动的方式。在一个多样化的公共空间里, 修辞能力强的博物馆会用多元的观点讲故事: 既包含了我们所认为的高潮和低谷, 又包含了我们所期待的现代模糊叙事和邀请参观者共同思考的体验。

关键词: 博物馆 修辞学 公众 国家认同

Abstract: To be relevant in our world, modern museums have become “multicultural platforms for negoti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museum. The museum today therefore sees its mission not as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but as the production of a sociopolitical effect in its at-times resisting community, and new museologists, in turn, study these effects of museums on the world. The new centrality of visitor response is a move towards audience awareness that brings museum studies closer to rhetoric. In the terms of classical Aristotelian rhetoric, once the present-day visitor is the focus the museum moves from a forensic institution, concerned chiefly with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ast, to an epideictic institution, concerned chiefly with the values of the present. It is the contention of my research that it is as epideictic institutions that museums make their mark in the world. I argue, therefore, that a rhetorical lens can bring a new dynamic and new insights to museology because the focus of rhetoric is on what it means to be a public and to operate collectively in the public sphere. In a diverse public sphere, rhetorically persuasive museums tell a story that has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that includes both high and low points in public history, and that embraces the ambiguity we expect of modern storytelling, inviting visitors to ponder an experience.

Key Words: Museum; rhetoric; publics; national identity

一、前言

博物馆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它保存了过去，对现在却没有太大影响。但历史文化类博物馆讲述国家、州或城市的故事——这些机构中最优秀的一批塑造了国家认同感，并对公民行为产生了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为深远的影响。国家认同感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神话，它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分工合作^[2]，而历史文化博物馆讲述的故事使这些国家神话永垂不朽——当然，博物馆也对这些神话进行了一些修饰。

尽管最近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缔造统一民族神话的声音，但今天的民族神话涉及的民族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多元。为了融入多元的世界，现代博物馆已经成为与公众的“多元文化谈判平台”^[3]。因此，现代的博物馆的使命并不是传播知识，而是在与其意见相左的社区中产生影响，新博物馆学家就要研究这些影响。

关于这一构想，在2019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5届大会上提出的有关“博物馆”定义的争论中可见一斑。博物馆不再是“获取、保存、研究、交流和展示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永久机构”，而是“民主化的……空间”，致力于“收集、保存、研究、解释、展览和增进理解”。现代博物馆关注的是参观者的理解，而不是物质遗产。

正如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委员会（ICOFOM）前任主席安·戴维斯（Ann Davis）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许多博物馆正在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馆藏转移到参观者身上。他们渴望更加民主，更加包容，更加平民和更加多元化。博物馆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真正的故事不止一个，而是很多，有时还会相互冲突。博物馆正在认识到，它们必须移除阻碍人们广泛参与其活动的障碍，必须变得更加以社区为中心”^[4]。以参观者反应为中心是向参观者意识的靠拢，使博物馆研究更接近修辞学。

二、修辞的作用

修辞学可以给博物馆学带来新的动态和见解，因为其关注点在于公众及其在公共领域中集体行动的方式，组织“围绕着自身关于话语、事件、对象、实践的关系来思考作为‘公众’的意义”^[5]。

正如《博物馆修辞：在国家领域构建公民身份》（*Museum Rhetoric: Building Civic Identity in National Spaces*，以下简称《博物馆修辞》）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

从修辞的角度来看，不列颠博物院（大英博物馆）“世界珍宝的无私拥有者”的形象是如何塑造的？它反映了怎样的公众身份？每个英国人如何参与到这种身份的塑造中？这一身份与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塑造的“美国阁楼（America's attic）”，或与泰国国家博物馆（Thai National Museum）塑造的“国王的金库（The King's treasury）”所带来的感觉，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些观点中的每一种都带给一个人对社会角色的不同感受——或多或少的等级或民粹主义，或多或少的旁观者或受人恩惠。因此，当一个人接受、调整或抵制国家所赋予的身份时，由此会在不同范围产生不同的反应。^[6]

修辞学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场景中如何互动，他们在联合和对立中形成想象中的社区。修辞学从公众生活中个人表述的字里行间去思考大众身份形成的机制。那些盛会、歌曲、纪念活动、网站、运动，或博物馆是如何让我们在社区中找到存在感的？修辞学与大众文化研究一样，关注于我们周围的文化产物和经验，这些文化产物和经验把我们培养成我们所认为的自己，就像我们的母语环境培养了我们的语言能力一样，即使我们不清楚它的语法规则，却依然运用自如。

在西方传统中，修辞学从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将其定义为“在每一个特定的情况下，看到可用的说服手段的能力”到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最近的概念“使用语言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手

段,诱导天生对符号做出反应的人进行合作”^[7],修辞学一直被视为一种说服他人的艺术。20世纪的修辞学家经常强调这些说服他人的节点并非单靠语言,并指出这种象征性行动对我们的作用和我们使用它的作用一样大,即说服既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既是无意识的,也是有意识的。无论是通过数小时的理性辩论,还是三十二分之一的有声演讲片段,无论是一份冗长的印刷宣言,还是两小时的电影,无论是一个响亮的声音,还是一个被咬的苹果,修辞都是周围世界被操纵的方式,目的是说服自己和他人某件事很重要,我们应该对此做出回应,正如伯克所言。修辞学家巴里·布鲁梅特(Barry Brummett)称它为“表达和管理意义的社会职能”^[8]。

那么,修辞学意义上的博物馆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博物馆是一个公共空间,它描绘的不是过去的我们,而是现在的我们。而我们是谁的问题是讨论任何关于我们现在做什么的关键第一步。因此,研究博物馆的修辞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如何影响公众对国家公民身份特征的争论。重新研究博物馆对“我们是谁”的描绘有助于扩大我们对公共空间、公民参与和国家认同形成的理解。

修辞学介入博物馆研究的历史,始于公共领域。传播学学者杰拉德·豪泽(Gerard Hauser)在其1999年出版的专著《乡土之声:公众与公共领域的修辞》(*Vernacular Voices: The Rhetoric of Public and Public Sphere*)中分析了公共话语在主要公共空间中引发对话的方式。修辞学家格雷格·克拉克(Greg Clark)在其开创性的《美国修辞景观》(*Rhetoric Landscapes in America*)一书中,从“任何通过向人们展示集体性的象征来促进社会合作的东西,而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象征来表明自己是修辞性的”这一前提出发,研究自然景观和建筑景观,将个人体验转化为公共体验,将一个地方打造成一个“修辞景观”,进而打造一个独特的国家故事。在这种背景下,博物馆与旅游指南、标语牌等组合在一起,作为一种为读者接触地方做准备的工具。

同时,通过布拉德福德·维维安(Bradford Vivian)和安妮·德莫(Anne Demo),尤其是基

础学者卡罗尔·布莱尔(Carole Blair)和她的合著者尼尔·米歇尔(Neil Michel)、格雷格·迪金森(Greg Dickinson)、布莱恩·奥特(Brian Ott),玛莎·杰佩森(Marsha Jeppeson)、恩里科·普奇(Enrico Pucci)等研究者在记忆和遗忘方面的工作,公共记忆研究在跨学科领域蓬勃发展,已经触及修辞学研究。早在布莱尔、杰佩森和普奇1991年对越战纪念碑的分析《后现代中的公共纪念》(*Public Memorializing in Postmodernity*)中,他们对公共纪念碑的研究就建立了记忆研究和物质性之间的联系。正如布莱尔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如果修辞的物质性不是其意义的象征性建构的职能(而是其真实的物理存在),那么我们必须从别处寻找:我们不仅要问修辞是什么意思,而且更要问它有什么作用;我们绝不能把修辞理解为它应该做的,而是其背后广袤的土地。”^[9]

在过去二十年中,这片“广袤的土地”已被许多美国人大量开采,因为修辞学家对记忆的激励作用越来越感兴趣,所以传播学学者对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进行了多个案例研究。艾米·K·莱文(Amy K. Levin)的《定义记忆》(*Defining Memory*)系列讨论了美国小型博物馆中记忆的本土化,迪金森、布莱尔和奥特的《公众记忆的地方》(*Places of Public Memory*)调查了博物馆和纪念馆中记忆的重要性,最近迈克尔·伯纳德-丹尼尔斯(Michael Bernard-Donals)的《记忆数据》(*Figures of Memory*)研究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中记忆的转移。同时艾瑞克·奥克(Eric Aoki)、迪金森和奥特在对西方各种博物馆的研究中合作推动了理论的发展。传播学学者肯德尔·菲利普斯(Kendall Phillips)和G·米切尔·雷耶斯(G. Mitchell Reyes)编辑了《全球记忆场景》(*Global Memory Scapes*)一书,将这种公共记忆工作扩展到美国以外的地方。这本书与彼得·阿伦森(Peter Aronsson)、阿内尔·阿蒙森(Arne Amundsen)和西蒙·J·奈尔(Simon J. Knell)的《国家博物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研究》(*National Museums: New Study from Around the World*)等著作和《博物馆修辞》一起出版,考察了

在一个全球分散的世界中构建公共记忆的复杂性和公共公民身份的的稳定因素。

三、修辞博物馆学

修辞博物馆学，一种研究个体如何通过物体、文本和空间将他们的身份与公民身份统一起来而被说服的博物馆学，能为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做出多少贡献？答案是很多。博物馆用修辞性的叙事框架来阐释社会世界，它充满了叙事的标记，把时间和因果关系叠加到一个国家的故事上，这个故事更多的是一种随机的机会和选择。它把物赋予了强烈的情感，用物叙事。也就是说，博物馆将一个国家的生活故事分层到社会领域，提出了一个统一而又多样化的过去。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述的民族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统一叙事在发挥着作用。正如《博物馆修辞》一书中所写：

“古代中国”展似乎满足于通过物，而非叙事来引导参观者。然而，故事也在这里展开。首先，展览以五千年时间为序。其次，它的编年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常统一的叙述，即历时事件和共时参与者所描绘的精美的人工制品。每个展厅入口处的文字板上反复叙述着这种统一，其中许多文字板上都写着类似这样的文字：“隋朝的兴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过300年的分裂和民族融合，中国在公元6世纪末再次进入统一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统一”是一个基本信息，它包含少数民族占领中原，这并不是那些经历过它的人一定会感觉到的那种破裂，而是（就像伦敦博物馆里的维京人和秘鲁的西班牙人一样）一种统一的叙述：

“多民族政权和统一，13世纪，蒙古人崛起，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多极化的多民族政权。”这种统一的叙述也在空间上被描绘出来，例如在“战国时期的民族”这一部分，被描述为“边缘人”的中原民族之外的民族也被放置在展厅的边缘，

展厅中央陈列着来自中原的文物。正是通过不断统一的框架镜头，参观者们穿越了复杂的年代，看到了令人惊叹的物品。^[10]

反过来，这种关于社会多样性统一的博物馆叙事也在修辞学上起到了作用，它邀请每个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故事与集体故事联系起来。修辞博物馆学让历史、社会叙事和个人身份交织成为身份认同过程的经纬线，不断演变的公共价值，唤起记忆，在物质空间中显现出来。

此外，通过用物来构造国家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览不仅帮助观众认同了自我，反映了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但也必然掩盖了博物馆里未涉及的其他故事的事实）。所有的博物馆（历史的、科学的和艺术的）都选择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将它们变成精心制作的展览。反过来，这些选择必然会促进某些价值观和观点高于其他价值观和观点——伯克在几个场合描述了这一过程，“忠实反映现实的词汇”必须发展出“选择现实的词汇”，而这些词汇有时“起到反映现实的职能”^[11]，当人们讨论他们的世界时，某些观点必然会被强调，其他的则被忽略。这种观点强调了博物馆作为国家的“文化黏合剂”的重要性，即统一国家的叙述，同时也努力成为“文化激励”——选择推动国家走向未来的叙述。从这些角度思考，修辞博物馆学使得博物馆学家能够更多角度地探索博物馆对他们国家的影响。

四、争论中的观点

瑞典文化史家阿伦森是2010—2012年欧洲国家博物馆项目（eunamus）的负责人，他在该项目的最终研讨会上宣称“博物馆不是一座房子，这是一个争论中的想法”。阿伦森认为博物馆可以是一个能让人们聚集在一起，停顿下来，重新思考他们的世界的空间。这是人文科学对政治世界的贡献，为“思想走向行动”提供场所^[12]。

简而言之，博物馆不仅仅是记忆场所，而且是唯一有意跨越风格与内容、智力与情感、过去、现在与未来、统一与多样性、持久与变化之间界限的

公共信息机构。博物馆缺乏从审美之外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也正是博物馆应该承担这一角色的原因。博物馆与博物馆学能认识到模糊性和对话空间的潜力，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博物馆。

当博物馆中的官方文化试图吸引民众时，它发现自己与流行文化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多元化的故事应该被描述和展示，以创造一个“真实”的历史身份。因此，修辞学家和博物馆学家很可能会在新博物馆运动中，在更大程度的对话中找到共同点，这场运动主张将博物馆作为社区参与和社会对话的场所。

正如博物馆学家索菲娅·普萨拉（Sophia Psarra）所总结的：“今天博物馆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方面，分类的主题；另一方面，个人或国家身份，这标志着博物馆从普遍接受的事实转变为社会构建的主题和内容的展场，从展示确定性事实转变为塑造个人的手段和背景，从科学转变为叙事，从关注社会和文化变革转变为关注参观者体验的复杂性。”^[13] 21世纪，博物馆的这一新角色不仅体现在博物馆向参观者展示信息的方式上，也让博物馆与世界产生了联系。“在这一转变中，博物馆建筑的轨迹已经从公共纪念碑转向空间体验”，普萨拉指出，“从形成社会事件转向塑造国家和文化愿望”^[13]。换句话说，现代博物馆——不是所有的博物馆，而是那些最具创新性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博物馆学家能够发现豪泽关于公民生活的公共论述的那种公共领域。

这种从公共纪念碑到空间体验转变的例子是贝尔维尤博物馆（Bellevue Museum）。这家由18世纪的米白色豪华酒店改造而成的博物馆2005年才开馆，用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展览来讲述这个国家的历史。据其新闻稿称，仅仅10年后，它的永久馆藏就“经历了彻底的转变”“新的展览将围绕对我们的社会很重要的问题来组织，这些问题也代表了比利时的特殊性”。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注意到40%的参观者是年轻人，于是召集了一群讲佛兰德语和法语的18—25岁的年轻人，策划了一个新的、不按时间顺序的、更有主题的展览。“我们的国家有

一段年轻而动荡的历史，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迅速的变化。重要的是，一个关于比利时的博物馆也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在一个有可能因语言差异和移民问题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在这个时候，反映令人信服的国家历史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优先考虑的事情，贝尔维尤正努力更新其美学形式，使之更为现代，更为多元，始终保持与现实的对话。如今，贝尔维尤的网站通过将历史与现在联系在一起的主题空间来彰显其现代性：“民主、繁荣、团结、多元化、迁徙、语言和欧洲：贝尔维尤博物馆帮助你发现比利时。表现今天，追溯历史：用现代的、独创的方式来更充分地了解现代比利时。”^[14]

五、作为交汇点的博物馆

作为修辞空间，博物馆是公共空间中更常见的各种对立力量的交汇点：公众与学术，政治与美学，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

通过将公共世界和学术世界并置，博物馆重新定义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一角色在世界各地并不总是受欢迎的，知识分子自己也不能总是成功地体现这一角色。在科学、艺术、社会和历史等领域，博物馆也明白有必要将知识和探求知识的热情与参观者交流。在我到博物馆探索民族主义的旅行中，我经常发现自己被那些我以前一无所知的展览迷住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秘鲁古代陶器，澳大利亚内陆气候变化，阿根廷现代画家，北极圈土著文化……如此多的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地质学、天文学、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引人入胜的叙事，汇集在各国的国家博物馆。是以物叙事的力量让参观者驻足，而博物馆之外的学术领域往往难以拥有这种力量。

人们有意将智力领域和大众领域在博物馆一分为二：博物馆吸引公众了解知识。正如古罗马的修辞家们所认识到的，在博物馆练习口才是为了说服参观者去理解他们的思考。

与此同时，通过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博物馆有助于戳破一种错误观念，即在当今这个由数据和营销驱动的世界，美学的价值已经降低。在博物

馆表现出来的修辞中，将逻辑和情感统一为深思熟虑的、以理服人的行动。人们想要有更多的公共社团，要首先有这种渴望。因此，与团结社区的期望并行的是，人文学科在博物馆的传播，既促进了稳定（博物馆强化普及国家历史），又保持了社区多元性（可以对知识和政策自由讨论）。

例如，最近开放的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是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的一部分，其职能为展现“一个人的旅程，一个国家的故事”，并引用其创始馆长朗尼·博奇（Lonnie Burch）的一句话：“这个博物馆将通过美国非裔镜头来讲述美国的故事。这是美国的故事，这座博物馆是为所有美国人准备的。”如它的兄弟馆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一样，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国家博物馆并不回避将非裔美国人的故事在一个饱受压迫和种族主义的背景下展开，通过强有力的物证和对奴隶制的叙事，使参观者了解并从情感上关注这种痛苦、反抗和自由。它还融入了文化庆祝活动，如在官方网站中的介绍，“环形、体验性、介绍性空间中，向参观者介绍非洲裔美国人和非洲当地人的文化及五种表现方式，即风格：形象和身份；食品：文化和烹饪；艺术才能：手艺和创造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运动：手势和交谊舞”^[15]，与其说这是传播知识，不如说是让参观者沉浸式地体会到非洲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持续影响。

博物馆有机会将文化的复杂性降低到一个更物质的层面，在国家故事的背景下，解决并调和外部世界中似乎过于无定形，难以处理和未知的分歧，这就使博物馆以及它们说服参观者体验的人文文化，在关于价值和走向更美好未来的行动的世俗政治辩论中，扮演了一个务实的角色。

最后，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即可行的和理想的并置，博物馆面对着此消彼长而产生的无奈。历史学家斯蒂芬·伯格（Stefan Berger）指出，国家博物馆尤其面临着来自出资方国家的“诱人要求”。

“首先，国家叙事正在复兴，博物馆越来越多地被要求讲述这个国家令人振奋的故事，并为公民提供

文化黏合剂。其次，人们要求博物馆考虑不同阶层的公民身份多样性。他们还被要求讲述本国与邻国的故事。最后，博物馆还要教育公民宽容世界性的价值观。”^[16]这些需求中的每一个主体，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外交和伦理都被视为现代公民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博物馆的任务不仅是描绘以上愿景，而且还要促进它们的实现。博物馆以物来布展，有助于他们与公众达成共识，因为物不是美好明天的梦想，而是来自于过去或现实的成果。

例如，新西兰的蒂帕帕东加雷瓦国家博物馆（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通过一系列精美的并置展览显示了其作为国家文化黏合剂的作用，庆祝国家统一，同时也发挥文化激励作用，鼓励新观点。博物馆要求参观者从他们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思考，今天作为一个新西兰人意味着什么。首先要从它的名字说起。根据参观者指南，“Te Papa Tongarewa”在毛利语中的意思是“存放珍宝的地方”。馆藏的土著毛利人、欧洲定居者、（最近的）太平洋岛民的文物表明这个国家的共同遗产包括来自多种文化的宝藏。双语（英语／毛利语）标识和对多种观点的悉心描述也强调了这种混杂性。据博物馆网站介绍，博物馆的Te Marae会议馆是一个传统的毛利建筑，“在21世纪，为创造一个真实而包容的社区会议场所，博物馆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它融合了毛利、欧洲、亚洲和太平洋文化的象征，“这基于Te Papa是国家论坛的理念，体现了博物馆核心的双文化伙伴关系精神”。

在牢固地巩固了一个多样化但统一的新西兰的共性之后，博物馆转移到展示这个国家不同侧面的挑战。例如，最近的一个展览记录了19世纪欧洲与毛利人的战争，另一个长期展览关注难民的斗争。它最新的太平洋岛民展览要求参观者这样考虑自己的身份：“奥特亚罗瓦（Aotearoa，新西兰）在地理位置和历史上都是太平洋地区。但是新西兰人认为自己是太平洋岛民吗？”^[17]

在博物馆的核心展区，悬挂着博物馆的一件关键展品：《怀唐伊条约》，这是1840年英国王室和毛利酋长之间的协议。一个多世纪以来，其中很

多条款基本被忽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条款一直被用作纠正侵犯毛利人权利行为的模板。在新的新西兰，它承担了基础文献的角色，在现代博物馆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标牌告知访客，该条约涉及“对现代新西兰至关重要的思想”。但该文件仍有争议，条约签署的目的在现代国家仍然被讨论。因此，条约周围环绕着扬声器杆，播放着不同人士对条约的不同观点。一些观点称赞它的变革性，另一些则怀疑社会是否在保护少数群体权利方面走得太远了。允许在一个宣扬国家统一的博物馆内进行辩论，意味着辩论不会被视为与国家对立。可以讨论分歧——这说明博物馆对多方面的说服工作正在进行。正如伯克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理想的情况是，所有不同的声音都是党派修辞学家，他们的部分声音‘竞争性地合作’，形成整个对话的立场”^[18]。

六、今天的博物馆，明天的博物馆

今天的个人与那些似乎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共享空间，以至于人们很难理解统一的城市空间的概念，更不用说统一的故事、意义和价值观了。在当今异构性社会中，公众演讲和盛会被视为过于同质化，且宣传过度，无法真正团结人们。这种多样性可能导致不容忍和霸权主义盛行——告诉别人该相信什么/该如何行事；或者它可能导致疏远，即分离的，很少相互作用的文化飞地。但是，一个更为微妙的事实是，世界上一些最好的文化博物馆所展示的是寻求将相互竞争和困难的想法放在一起考虑。这些21世纪的博物馆提供了难得的公共空间，让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不同的人能够深思熟虑地探讨我们是谁，我们珍视什么，以及我们下一步愿意做什么等基本问题。博物馆作为一个修辞的空间，可以弥合彼此之间的鸿沟，因为它既能将共同的信念凝聚在一起，又能帮助一个社区设想新的可能。

以2011年北京首都博物馆的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个展览让人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它的“胡同生活”，与其说应该去学习什么，不如说应该去体验它。展览空间的外墙展示了各种独特的入口，这些入口通向经典的单层胡同结构，邀请参观者通过一个典型的入口进入展陈内部。观众能注意到巨大的博物馆空间是如何变得更加亲密，鼓励参观者在陈列柜和半封闭的展厅间穿行，五颜六色的艺术品描绘了“老北京”家庭生活和信仰的各个方面。在老剧院的桌子旁观众能放松，和其他参观者一起看演出。其他参观者也很放松，在民俗展品前摆姿势，向他们的子孙指出仪式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博物馆在这次展览中展示了如何将学术史融入叙事中，如何以物说史，并利用美学来吸引参观者。在北京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城市，接下来自然也会产生一些关于可行和可取的问题：胡同生活的利弊，现代化是城市人民更好的选择吗？用公寓楼取代胡同庭院有什么收获、又有什么损失？胡同生活的哪些方面可以在现代城市中保持（或已经保持），未来的城市规划如何更多地融入那些有益的元素？通过便利贴、参观者手册和触屏电脑，参观者可以回复这些问题，或将自己对胡同生活的想法加入其中，从而激发对社区的认同感。

允许展览内部以及参观者和博物馆之间的多元视角增加了参观者的国家认同感，而片面的宣传只能说服那些已经相信它们的人。有说服力的博物馆讲述的故事有多种观点，既有公共历史的高潮，也有低谷，包含了我们所期待的现代故事讲述的模糊性。博物馆的讲述要求访客思考，而不仅仅是信服。有时，博物馆专业人士或者他们的社区会担心太多的模糊概念，并希望宣称，要么老故事一直是正确的，要么新故事远远优于老故事。修辞学告诉我们，更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法要求人们思考可选方案，而这种可能性的理论化正是修辞学博物馆学的特殊贡献。

注释

- [1] Smeds, K.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in Museology: Call for Publ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2019: 164, retrieved from <http://network.icom.museum/icoform/meetings/next-conference/>.
- [2]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 [3] Smeds, K.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in Museology: Call for Publ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2019: 164, retrieved from <http://network.icom.museum/icoform/meetings/next-conference/>.
- [4] Davis, A. *Empowering the Visitors: Process and Problems, Visiting the Visitor: An Enquiry into the Visitor Business in Museums*, Transcript-Verlag, 2016: 91.
- [5] Dickinson, G., Blair, C., and Ott, B. eds. *Places of Public Memory*.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0: 3.
- [6] Weiser, M. E. *Museum Rhetoric: Building Civic Identity in National Spaces*. State College,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7: 8-9.
- [7] Burke, K.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1969.
- [8] Brummett, B.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r Culture*.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1: 12.
- [9] Blair, C. *Contemporary US Memorial Sites as Exemplars of Rhetoric's Materiality, Rhetorical Bodies*.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8.
- [10] Weiser, M. E. *Museum Rhetoric: Building Civic Identity in National Spaces*. State College,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7: 59-60.
- [11] Burke, K. *Tactics of Motivation*. *Chimera*, vol. 1, 1943(4): 27.
- [12] Aronsson, P. Keynote address delivered at Eunamus Final Conference: The Cultural Force of National Museums. Budapest, Hungary, December 12, 2012.
- [13] Psarra, S. *Spatial Culture, Way-Finding, and the Educational Message, Reshaping Museum Space: Architecture, Design, Exhibi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81.
- [14] Oechsner, M. The Belvue Museum Gets a Youthful Makeover, press release,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www.belvue.be/sites/default/files/press-file/pdf/20150224-belvue2016-press_release0.pdf.
- [15]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NMAAHC). About, Cultural Expressions, Slavery and Freedom, and Visiting the Museum, retrieved from <https://nmaahc.si.edu/>.
- [16] Berger, S.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Modern Europe—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Master Narratives*. Presented at Mapping and Framing National Museums, Stockholm, Sweden, April 28, 2010, p1.
- [17] Te Papa Tangarewa National 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Marae/Rongomaraeroa, Tangata o le Moana, and Treaty of Waitangi,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epapa.govt.nz/visit/exhibitions>.
- [18] Fogarty, D. *Kenneth Burke's Theory, Roots for a New Rhetoric*,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2015: 56-87.